

“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(壹)》国际学术研讨会”综述

2011年6月28—29日,由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办的“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(壹)》国际学术研讨会”在北京达园宾馆举行。来自中国大陆和香港、台湾地区以及美国、日本等地的70余位历史学、古文字学、古文献学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研讨会。会议共收到与会学者提交的45篇论文,内容涉及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(壹)》中的各篇。此外,一些学者还就清华简第一辑中所涉及的简文文本、竹简格式、古书成书等问题作了深入探讨。

会议开幕式上,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李学勤教授首先致辞,指出第一辑整理报告出版后在学术界引发了热烈讨论,此次会议的目的正是为学者提供一个交流的平台。吉林大学副校长、中国古文字研究会会长吴振武教授也代表中国古文字研究会致辞。在随后的专场研讨会上,与会者就清华简第一辑的各篇内容进行了专题报告和相互讨论。

一、《尹至》、《尹诰》研究。虞万里(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)《由清华简〈尹诰〉论〈古文尚书·咸有一德〉之性质》比较了《尹诰》与《咸有一德》的异同,并对《咸有一德》的性质和来源进行了讨论,认为《咸有一德》应是真古文《尹诰》之“传”,其来源可能是《古文尚书序》中所讲的孔安国承诏为《尚书》五十九篇所作的传,后经魏晋间学者重新整理而成。田旭东(西北大学文博学院)《尹摯与伊尹学派——以出土文献为考察中心》分析了马王堆帛书《伊尹·九主》的思想内涵以及战国时期伊尹学派的流行。廖名春(清华大学历史系)《清华简〈尹诰〉篇的内容与思想》就部分语词进行了训释,并认为《尹诰》的核心思想是在讲利益要与民共享,以此来争取民心,简文的“一德”就是“与民同利之德”。郭永秉(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)《清华简〈尹至〉“焮至在汤”解》认为楚简中的“焮”字与卜辞中的该字用法相同,其本义很可能就是表示一种夜间时称,意思是伊尹在夜间某个时段来到了汤之处。梁立勇(深圳大学中文系)《甲骨文“𠂔”补释兼释清华简“𠂔”》从音义角度分析认为“𠂔”、“𠂔”本为一字,“𠂔”当读为“翦”,指完全彻底的消灭。孙飞燕(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)《也谈清华简〈尹诰〉的“惟尹既及汤,咸有一德”》认为《尹诰》中的“惟尹既及汤”即《尹至》中的“惟尹自夏徂亳,焮至在汤”,“及”意为“至”,指伊尹至于汤的处所。

二、《程寤》、《保训》研究。罗新慧(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)《清华简〈程寤〉篇与文王受命再探》归纳了受命说在西周时期的大致情形,指出殷周变革之际,在“杀伐”之外,“扬梦”是周人用于翦商的重要方法,对于周人意义重大。艾兰(美国达慕斯大学)《〈保训〉及楚国书的问题》重点就“书”的概念、性质等问题进行了讨论。柯鹤立(美国理海大学)《清华简〈保训〉中的“训”及古代传播“训”的方式》认为,“训”一类的文献在战国时期是用于教学的材料,题材介于“书”和“诗”之间。王晖(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)《清华简〈保训〉“中”字义及其主题研究》认为《保训》“中”字与“重”、“幢”是同源字,指的是系有祖先名号的旗杆铭旌,反映的是西周之前的宗庙铭旌旗幢制度。冯胜君(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)《试论清华简〈保训〉篇

书法风格与三体石经的关系》认为《保训》篇书法风格具有三体石经中所体现的齐鲁地区特征,但文字形体结构仍多为典型的战国楚文字,在判定《保训》简文的国别与地域特征时应以字形为主要依据,不同意将《保训》定性为齐系文字的抄本。梁涛(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)《清华简〈保训〉的“中”为中道说》认为《保训》的“中”是指中道而言,表达了儒家的政治理念。曹峰(清华大学哲学系)《〈保训〉的“中”即“公平公正”的理念说综论》认为《保训》中所见的四个“中”,都只能理解为“公平公正”的重要治国理念,而不能视为某种具体之物,且与中庸之道及心学意义上的“中”无直接关系。

三、《耆夜》、《金縢》研究。裘锡圭(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)《说“夜爵”》指出“夜”可以跟“举”音近通用,“夜爵”即为“举爵”,古书常见。这里的“举爵”有可能兼指“自饮”和“复酌进宾”这两件事。夏德安(美国芝加哥大学)《饮酒与古代中国游戏文化:从社会学的角度读清华大学藏战国竹书“耆舍”》认为《耆夜》篇提供了战国时期有关酒令的根据,并由此讨论了古代中国游戏文化的价值。陈颖飞(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)《清华简毕公高、毕桓与西周毕氏》综合研究了西周毕氏世系及史事等若干问题。冯时(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)《清华〈金縢〉书文本性质考述》从清华简本与传世本在谥法、祝文称主名、穆卜与龟卜、说经之文、篇题等五方面的差异进行了分析,认为清华简《金縢》文本不是《尚书》原典,而是类似于《鲁周公世家》一类的后人引述说论之文,且自有篇题,重点在于弘扬周公文德。刘乐贤(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)《清华简〈金縢〉“𡗗”字试释》根据前人的意见,认为《金縢》中的该字读“质”最为合适,并猜测简本“𡗗”或从左边“示”旁得声,是“质”的通假写法,至于传世本作“功”,是将简本“𡗗”读作从右边的“工”声的结果。刘国忠(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)《试析清华简〈金縢〉篇名中的称谓问题》认为清华简中出现的“周武王”、“周文王”前所加的“周”字,是因为清华简抄写者为楚人,楚君称王,有很多与周王相同的年号,所以必须加以区分。袁金平(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)《清华简〈金縢〉校读一则》指出简本“秉璧𡗗珪”之“𡗗”应释为“戴”,意思是“加”,今本“植”是其同音假借字。

四、《皇门》、《祭公》研究。朱凤瀚(北京大学历史系)《清华简〈皇门〉初探》探讨了《皇门》篇中所反映的西周史事。王志平(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)《清华简〈皇门〉异文与周代的朝议制度》认为简本中的“𡗗门”即“皇门”的异文,并从语音和礼制的角度进行了分析论证。董珊(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)《释西周金文的“沈子”和〈逸周书·皇门〉的“沈人”》认为提出“沈”应读为“冲”,二字相通,义或实指年龄幼小,或相当于自称“小子”类的谦辞。夏含夷(美国芝加哥大学)《先秦时代“书”之传授:以清华简〈祭公之顾命〉为例》着重讨论了先秦时期“书”类文献的形成与传授过程。黄怀信(曲阜师范大学孔子研究院)《清华简〈祭公〉篇校释》将清华简《祭公》与《逸周书·祭公》,以及《礼记·缙衣》和郭店简《缙衣》所引《祭公之顾命》进行了对校,指出该篇整体上以《逸周书》之文为优,但清华简也有胜出者,《缙衣》所引虽有衍文,但亦有可取之处,四者互补,可以较好地恢复《祭公》原文的本来面目。

五、《楚居》研究。浅野裕一(日本东北大学)《清华简〈楚居〉初探》在楚与殷之间的密切关系、“楚人”名称的由来乃出于楚人自身语、此前认为居于一处的楚之郢都扩展为十四处、《楚辞·离骚》篇所见彭咸的线索、楚国形成过程等五个方面讨论了《楚居》带给我们的新知。李家浩(安徽大学中文系)《谈清华简〈楚居〉的“夷屯”及其他——兼谈包山楚简的“屯人”等》

认为“夷屯”即“夷陵”，在今宜昌市东，支持丹阳“枝江说”。黄锡全（中国人民银行参事室）《楚武王“郢”都初探——读清华简〈楚居〉札记之一》推断“疆郢”即为“免郢”，地点在今钟祥县郢州古城东的楠木山一代。陈伟（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）《清华简〈楚居〉“榭室”故事小考》认为“柰”相当于后世的“夕”字。徐少华（武汉大学历史学院）《季连早期居地及相关问题考析》详细分析了季连氏由北向南的迁徙时间和迁徙路线、居住地点等问题。

罗运环（武汉大学历史学院）《关于季连纠葛问题的探讨》指出《楚居》对于研究楚人的族源、世系、地理以及文本的性质提供了宝贵的契机。江林昌、孙进（烟台大学中国学术研究所）《清华简〈楚居〉与〈楚辞〉有关问题》比较了《楚居》与《楚辞》在内容上的关联，主张楚族起源西方说。孟蓬生（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）《〈楚居〉所见楚王名考释二则》分析论证了楚简中宵囂和武王之名与文献记载之间的关系。沈建华（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）《〈楚居〉都人与商代若族新探》分析了都人自商时起由晋南地区逐步南迁的流变过程。赵平安（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）《妣佳、妣毖考》认为妣佳就是妣鸟，即指来自商部落的妣，反映了楚文化与商文化的融合。李守奎《论清华简中的昭王居秦溪之上与昭王归随》指出“秦溪之上”当为随与唐之间的澧水流域。

六、其他研究。李零（北京大学中文系）《古文字笔记：离与竊》指出楚文字中读为竊、察和带的字都从离。王辉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）《一粟居读简记（一）》讨论了出土竹简中部分文字的隶定和篇章的定名问题。李天虹（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）《湖北出土楚简（五种）格式初析》介绍了这些竹简的形制特点及考察成果。徐在国（安徽大学中文系）《上博五“稷（稷）”字补说》分析了“稷（稷）”字的构形问题。李锐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研究所）《由近年出土文献论〈尚书序〉的有关问题》探讨了《尚书》的书名、篇名和《书序》的来源、错误、成书年代等问题。李均明（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）《清华简首集简册文本解析》分析了清华简九篇文本的载体、符号、内容、复原等问题。谢维扬（上海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）《从〈清华简〉看古书成书的一些问题》讨论了古书文本在形成和流传过程中的复杂情况。陈伟武（中山大学古文字研究所）《清华简释读拾遗》对部分文句进行了新的释读。

在这次会议上，学者们围绕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（壹）》所涉及的各方面内容进行了广泛讨论，有力地推动了相关领域的研究进展。最后，李学勤先生还介绍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》第二辑的整理工作，并就一些重要问题回答了与会学者的提问。本次国际研讨会极大地推动了清华简及相关的古文字、古文献、先秦史等领域的研究，相信在此基础上，学者们将会有更新的研究成果面世。

（清华大学历史系 牛鹏涛）